

关于龙泉青瓷几个问题的认识

周丽丽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Longquan kiln was the famous celadon-producing kiln during Song,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s showed the first baking year could be around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tyle of Longquan celadon first originated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ongquan Kiln Celadon First Baking Year Decoration Change

内容提要 浙江省境内的龙泉窑是宋、元、明早期著名的青瓷窑场,尽管考古资料揭示龙泉窑的始烧年代可能早至东汉,但形成龙泉地区青瓷风格的制品则是起于北宋。

关键词 龙泉窑 青瓷 始烧年代 装饰变化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浙江省考古所对龙泉地区各个时期的窑场展开了系统的发掘,使龙泉青瓷的相关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随着出土物的增多仍不断产生,其中笔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有相对纪年墓葬、遗址、窖藏出土的龙泉青瓷所反映的装饰变化时段及产生瓷器装饰变化的原因,并由此引发作者对 1991 年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龙泉青瓷烧制时代及内蒙古集宁路出土龙泉青瓷上限的问题的再次思考,现就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龙泉青瓷装饰产生变化时段的认识

从传世与出土的龙泉青瓷看,其装饰变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流行刻划花装饰,第二阶段主要以釉色取胜,器表大多素面无纹,第三阶段刻、划、印、贴、加彩等各种技艺大为盛行。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以北宋、南宋、元作为瓷器装饰风格发生变化的三个时段,然而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表明,瓷器装饰的变化与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必然

的联系,相反龙泉青瓷装饰风格的显著变化,多是在新时期开始之后发生的,这可从下例已发表的有相对纪年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得到证实^[1]:

1. 1959 年浙江省丽水市保定凤凰山宋淳熙五年(1178 年)何称墓出土的南宋龙泉梅瓶(图一),施青釉,釉层薄,釉面透明,器身素面,器盖外沿刻划莲瓣纹。其时离北宋已 50 余年,但器皿釉色仍保留有北宋青釉特征。

2. 1978 年江西省清江县花果山宋开禧元年(1205 年)墓出土的青釉鹅颈瓶,其形虽仿北宋官窑、汝窑的制品而来,但釉层较厚,釉呈粉青失透状,与北宋流行的透明青釉已有较明显的区别,通体素面无纹,以釉色取胜。

3. 1963 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卓刀泉宋嘉定六年(1213 年)任晞晴墓出土的青釉胆式瓶,胎白釉厚,釉面开片无玻璃光,釉色青灰中闪绿,与北宋的透明釉区别明显,通体素面无纹。

4. 江西省樟树市清江县寒山杨村南宋景定

四年(1263年)墓出土的青釉印花菊瓣纹执壶,釉色青中泛灰发黄,釉面乳浊,壶身所印阳纹细线条印花开了元代同类技法的先河,纹样构图略显简单,已具有南宋制品的典型特征。

5. 浙江省德清市城关镇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吴奥墓出土的青釉盘口瓶和鬲式炉,施青绿厚釉,前者釉面开片,后者无开片,均素面无纹,系仿官窑而成的典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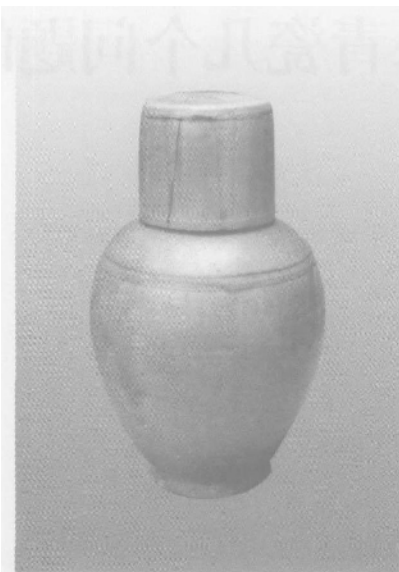
6. 浙江省巨州市柯城王家瓜园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青釉剔刻花莲瓣纹碗和钵式碗,釉色青绿,釉面莹润,为南宋龙泉窑的代表作品。

7. 浙江省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叶梦登妻潘氏墓出土的青釉剔刻花莲瓣纹碗,釉色青绿,与上述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物特点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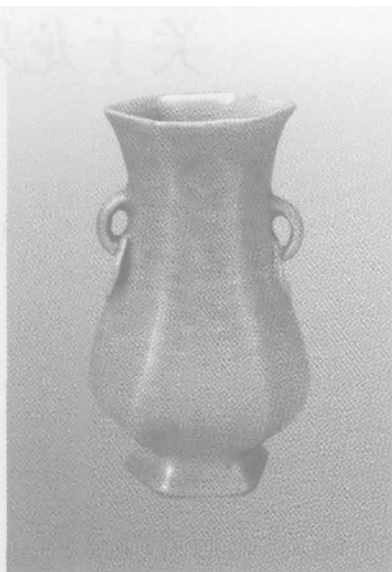
8. 浙江省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墓出土的青釉六角形瓶(图二),通体有印花纹样,图案不太清晰,釉色青中泛灰黄,釉层较厚,显示了南宋中晚期制品的典型特征。

9. 杭州市老东岳元大德六年(1302年)鲜于枢墓出土的青釉管耳瓶和鼎式炉,前者釉色粉青,素面无纹,后者釉色青灰,除双耳与足外侧有印花、器身有弦纹外,余皆素面,管耳瓶虽承袭南宋而来,但颈部较南宋同类器高,显示了元代制品的特点,器表主要以釉色取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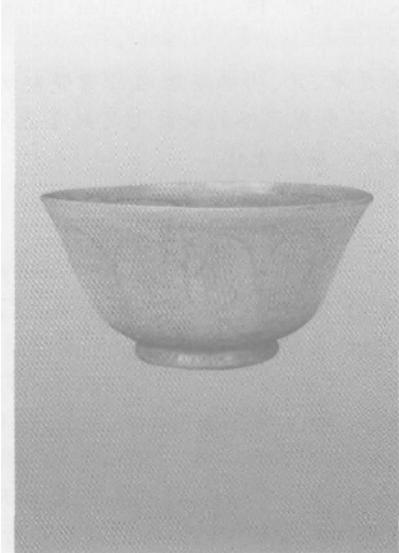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上述有相对纪年墓葬出土的青瓷,基本上能反映龙泉青瓷不同阶段的装饰风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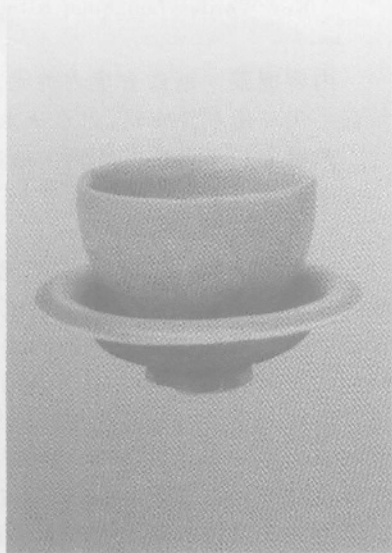
图一// 南宋梅瓶



图二// 南宋青釉六角形瓶



图三// 南宋刻花蕉叶纹碗



图四// 北宋盏托

土的青瓷大多是南宋制品,其中最早的是淳熙五年(1178年)墓出土的青釉盖瓶,器物下限虽已是南宋建立政权后的51年,但瓶釉色青灰中闪绿,釉层薄,釉面透明,呈玻璃光,盖外沿刻划莲瓣纹,釉色、刻划花装饰乃至造型基本上仍保留了北宋制品的特点,表明龙泉窑在进入南宋后的颇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在釉面装饰还是纹样装饰上都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变化,相反器皿仍然延续了北宋制品的特点。朱伯谦先生主编的《龙泉窑青

瓷》图录中收集的南宋前期刻花莲瓣纹碗、刻花蕉叶纹碗(图三)、刻花云纹花口碗、刻花盘口壶等多与上述青瓷盖瓶的特点相同,且与同图集收录的北宋盏托(图四)、碟(图五)等刻花纹样大致相近,表明宋政府从北宋过渡到南宋之时,龙泉青瓷的装饰并没有随之变化。龙泉青瓷装饰发生明显变化应是从13世纪开始的,主要反映在釉料改革上,如上述宋开禧元年(1205年)、嘉定六年(1213年)、景定四年(1263年)、咸淳元年(1265年)、咸淳四年(1268年)、咸淳十年(1274年)、德祐元年(1275年)等墓葬中出土的龙泉瓷,釉大多呈粉青色,釉层颇厚,主要以釉色取胜,器表大多素面无纹,只有少量器皿采用印花等装饰技法,表明龙泉青瓷由透明薄釉改为粉青厚釉、由流行刻划花工艺到盛行素面厚釉装饰的具体时段是13世纪初。元政权建于1271年,在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龙泉青瓷装饰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改变而变化,大部分器皿仍以厚釉素面取胜,即使是1302年,建元已30余年,出土的龙泉青瓷仍以素面为主,表明龙泉青瓷盛行的印、贴、剔、刻、点彩等多种工艺是进入14世纪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的,龙泉青瓷装饰的这一风尚一直延续至15世纪早期,变化的三个时段相对比较清晰。

二 遂宁窖藏出土龙泉青瓷的时代及集宁路出土龙泉青瓷上限的认识

1991年9月在四川遂宁中区南强镇金鱼村发现了一座出土有985件瓷器的窖藏,其中龙泉青瓷的数量仅次于青白瓷,有357件之多,这批窖藏一经出土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窖藏的年代问题更是讨论的热点,绝大多数专家根据南宋末年,四川成为宋蒙战争拉锯战战场,人口流失、城市废弃,许多不易携带的物品先后在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或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时埋入地下的推断,得出遂宁金鱼村窖藏是南宋后期的窖藏,金鱼村窖藏出土瓷器的生产下限当在此之前不久的结论。

笔者以为如果遂宁窖藏的时代确实是南宋的话,那么窖藏出土的器物再晚也不会超过南宋中期,然而无论从当时的局势还是器物特征分析,这批瓷器都不可能是南宋中期运至四川的。从史籍记载看,至迟从嘉定十二年始,四川已陷入战乱的状态,之后的端平三年(1236年)遂宁府因兵乱迁至蓬溪寨,至景炎三年(1278年)元兵攻入重庆,四川始终蔓延着战火,作为一个私人收藏不可能在政局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再从长江下游成批地

运进景德镇与龙泉等窑的瓷器,因此,窖藏所出器皿如果正是南宋制品的话,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在嘉定十二年之前就制成了,最晚也不会超过端平三年,否则只能是元代的产品,而且必定是政权稳定之后的制品。

从器物本身显示的时代特征看,北宋至南宋早期龙泉窑使用的青釉多是浙江地区传统的透明青釉,釉层薄,釉面有玻璃光,而南宋中晚期至元早期龙泉窑使用的多是经过改革的失透厚釉;北宋至南宋早期的龙泉青瓷流行刻划花装饰,而南宋中晚期至元早期的龙泉青瓷则以釉色取胜,器表多素面无纹。四川遂宁出土的龙泉青瓷所反映的釉与装饰特点正是南宋晚期或元早期制品的特点,不可能早至南宋早中期,而南宋晚期制品的可能则已被上述战争因素所否决,那么除釉与装饰外,南宋晚期与元早期器皿的造型是否有变化呢?从传世与出土龙泉青瓷看,南宋中晚期除一些碗、盘、五管瓶等制品仍承袭前朝形制外,大部分器型受当时官窑的影响,开始生产类官的形制,较早的有仿北宋官窑的鹅颈瓶(江西清江1205年墓出土),稍后的有洗口长颈瓶、凤耳或鱼耳盘口长颈瓶、琮式瓶、鬲式炉、弦纹三足炉、敛口碗等等,与南宋中晚期、元代釉面装饰没有多大改变的特点不同,南宋中晚期与元早期器型在细小部位上的变化已逐渐显露。如琮式瓶的器身,元代的往往比南宋修长,凤耳、鱼耳瓶及长颈瓶等的颈部元代的更长。就贯耳长颈瓶而言,最早由南宋官窑仿汉铜质投壶而成,南宋龙泉窑受官窑影响也烧造类似的器皿,元代继续烧造,但元代贯耳瓶较南宋制品的变化主要反映在颈部增高上,上述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1302年)墓出土的贯耳瓶就是一例,遂宁窖藏出土的贯耳瓶与之风格完全一致,表明这类形制的贯耳瓶应该是14世纪前后开始生产的,不可能是13世纪早中期的制品,遂宁同出洗口弦纹瓶颈部比典型南宋相类器皿长的原因应该也是时代风尚的变化所致,类似的形制变化还见于元代其他窖藏的出土物上^[2]。不仅如此,遂宁出土的大量龙泉青瓷多有颇为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五管瓶(图六),其形与传统的完全不同,器腹微扁圆鼓,五管在器腹上部,口折沿,折沿平中见圆弧,沿端胎薄呈尖弧状,相同的形制在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其所显示的正是同时代器物的共同特性。除此之外,遂宁窖藏所出龙泉青瓷造型的元代特征还表现在荷叶形盖罐(图七)、葫芦形水注(图八)、贴花香炉等器

皿上^[3] ,这些元代器型特征鲜明的制品不可能是在四川开始战乱的1236年或之前不久的1219年运至遂宁的,由此可以得知,在此之前的器皿尚不具备上述器型的特征,在此之后近40年的动荡时间里更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器皿运抵四川,因此这些带有元代气息的制品只能是在战争结束后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才从内地运至四川的。值得注意的是窖藏所出一件香炉器腹所贴缠枝菊花纹与集宁路元代窖藏所出碗盘内所印折枝菊花纹(图九)中的花朵构图完全一致,显示了相近时代图案的共同特点。此外,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龙泉青瓷的元代特征还可从一件香炉腹部的八卦图案得到证实(图十),八卦纹虽在南宋之前的其他工艺品上已经出现,但作为瓷器纹样则以南宋官窑制品为早,传世完整器不多见,元代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将这一官用图案发展为民用纹样,其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另外,从四川遂宁出土的龙泉青瓷的总体风格看,虽尚未出现元中晚期盛行的剔、刻、印、加彩等技法,但从上述出土龙泉青瓷的特征及与龙泉青瓷同出的景德镇青白瓷上大花大叶的剔刻花等装饰看,已显示了与南宋不同的元朝瓷器风格,这些实物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佐证窖藏时代当在14世纪初。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的集宁路古城遗址,自1958年以来曾有多次重要的发现与发掘,2002年5月至今,为配合国道建设,清理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发现了多处窖藏,出土的器物除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外,尚有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建窑、霍窑等窑场的瓷器,其中大量制品具有元中晚期器皿的特点,如景德镇窑的枢府釉、青花、釉里红制品,器底不施釉、底心突起的天蓝、月白或其上加红斑的钧窑碗、盘,以及器身有印花、刻花、贴花等装饰的龙泉窑盘、碗、香炉、高足杯、荷叶形盖罐等。不仅如此,集宁路经过1358年至1368年二次战火后,彻底毁灭,之后不可能有居民重新居住^[4],属于蒙明边界之间的空白地段,因此集宁路出土瓷器的下限相对比较清楚,笔者以为,根据史料分析,这批器皿最晚不会晚于1357年红巾军兵分三路北伐,继而攻打集宁路之时,进而可推至1351年爆发的针对蒙古统治者的红巾军大起义之前,因为1351年之后,蒙古已出现了战乱的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内地的瓷器不可能再大规模运至集宁路,同时从出土龙泉器皿的尺寸大多不高大,元代晚期风格强烈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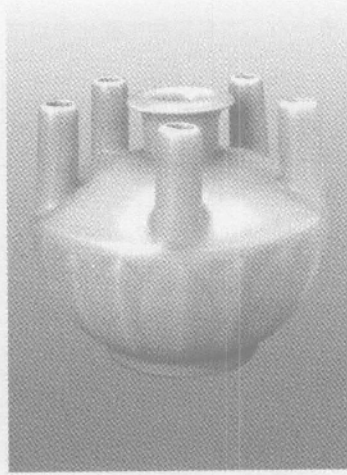
品不多的情况推断,集宁路窖藏、遗址发现的瓷器下限当在1351年之前。

集宁路出土瓷器的上限同样也在元代,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上限的相对时段该定在何时值得进一步探讨。就出土的龙泉青瓷而言,器物装饰已完全摆脱了南宋中晚期至元初的风格,即由以釉色取胜的风尚转变为以刻划、印贴花等为主的新的装饰风格,其中除折沿贴花双鱼纹盘、蔗节形洗、小足莲瓣纹碗等与南宋产品较难区别外,绝大多数制品的装饰已形成了新的时代风格。如香炉壁所贴缠枝牡丹纹具有元代晚期大花大叶的特征,碗、盘、高足杯等器内底折枝花纹除采用传统刻划花技法外,大部分采用戳记印花工艺而成,根据有相对纪年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分析,这些带有戳记印花装饰制品的大致制作年代当在14世纪(即13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此集宁路出土的龙泉青瓷最早也只能是14世纪早中期的制品。此外从集宁路发现的与龙泉青瓷同出的景德镇青花瓷看,这批瓷器基本属于成熟时期的青花制品,就目前已公布的资料看,有纪年墓葬出土的青花器多在13世纪20年代之后,其中1978年杭州出土的青花点彩观音像见于至元丙子纪年墓,至元有两个丙子年,一为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另一为后至元二年(1336年),鉴于青花瓷多出土于14世纪纪年墓的时间推算,这三件青花观音像的下限应该属于后至元二年。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流传国外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瓶的发现,一大批与之风格相类的青花瓷被对照出来,称为“至正型青花”,根据这些考古资料与传世实物,大多数学者认为景德镇成熟青花瓷的流行年代,应该在14世纪30年代至14世纪50年代前后这段时间内。既然集宁路出土的青花瓷属于这一时期产品,那么集宁路出土其他品种的瓷器上限亦不会晚于14世纪30年代,也就是说集宁路窖藏、遗址出土物的比较精确年代当在1330年至1351年的20多年内。无独有偶的是集宁路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枢府”款卵白釉器,有关研究人员根据“御土窑”的烧造年代当为泰定后(即1324年之后),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相对烧造年代亦在1328年以后的时段推算,“枢府”款卵白釉器的上限亦必在泰定后^[5],集宁路窖藏的上限自然应该在1330年前后。上述元代龙泉青瓷由釉面装饰转变为刻、划、印、贴等多种装饰工艺的上限也当在14世纪3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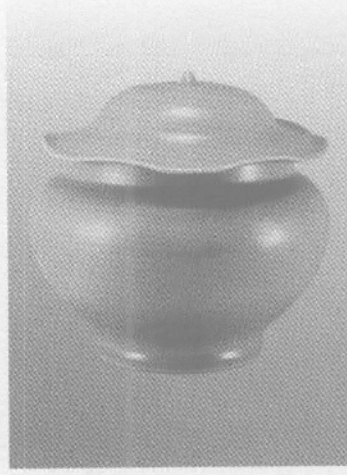
三 龙泉青瓷装饰产生变化原因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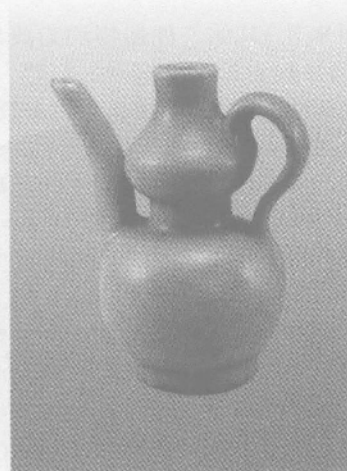
图五// 北宋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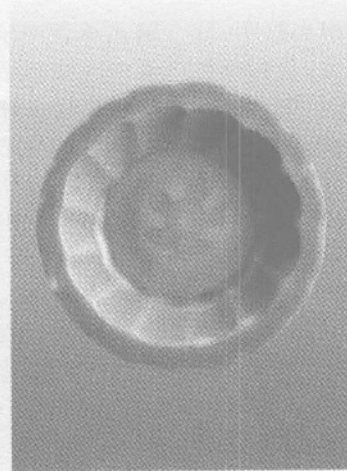
图六// 元遂宁五管瓶



图七// 元遂宁荷叶形盖罐



图八// 元遂宁葫芦形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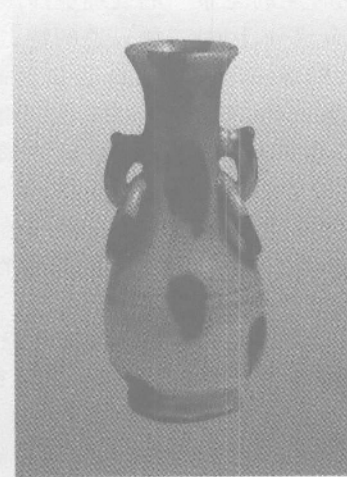
图九// 元印花折枝菊花纹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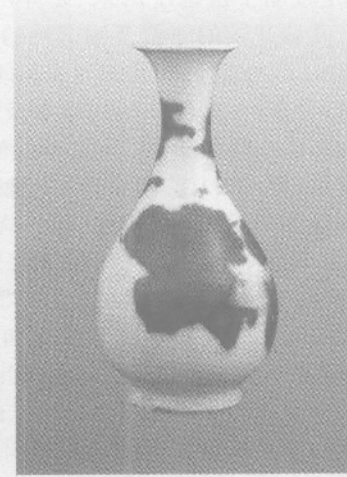
图十// 元遂宁八卦纹香炉



图十一// 元青釉红斑碗



图十二// 元青釉褐斑瓶



图十三// 元白地红斑瓶

表一// 龙泉青釉主要化学组成

年代	品 名	Na ₂ O 氧化钠	MgO 氧化镁	Al ₂ O ₃ 氧化铝	SiO ₂ 氧化硅	K ₂ O 氧化钾	CaO 氧化钙	TiO ₂ 氧化钛	MnO 氧化锰	Fe ₂ O ₃ 氧化铁
北宋	标本 1	0.33	1.74	14.73	60.57	2.14	17.3	0.31	0.7	1.51
北宋	标本 2	0.4	2.01	14.68	60.49	2.59	16.3	0.32	0.78	1.4
南宋	盒身	0.26	1.05	13.16	65.86	4.21	13.44	0.11	0.10	1.49
南宋	洗	0.36	0.83	12.61	70.12	4.48	9.35	0.11	0.21	1.78
南宋	洗	0.26	0.77	13.29	66.03	3.68	14.23	0.11	0.04	1.52
南宋	碗	0.75	1.09	13.73	66.23	4.29	12.02	0.11	0.18	1.53
元	加彩水注	0.89	1.02	14.06	67.97	5.95	7.76	0.15	0.50	1.72
元	加彩瓶	1.31	1.52	14.23	65.32	5.71	8.61	0.12	0.59	2.20
元	碗	0.72	0.91	12.84	66.06	4.98	12.36	0.11	0.47	1.46
元	高足杯	1.53	1.35	13.23	67.56	5.80	8.05	0.14	0.68	1.40

龙泉青瓷装饰三个时期的变化相当鲜明:北宋至南宋早期器皿釉薄,釉面有玻璃光,佳者釉色青绿,流行刻划花装饰;南宋中期至元早期器皿釉厚,部分制品采用多次上釉,多次烧造的工艺而成,佳者釉色粉青、梅子青,釉面失透,器表多为素面;元中期至明早期器皿釉层较厚,釉面失透,佳者粉青,流行剔、刻、划、印、点彩等多种装饰工艺。现就龙泉青瓷装饰出现三个时期变化的相关问题分析如下。

1. 釉料的改进与龙泉青瓷装饰的变化无关

由于龙泉青瓷装饰的变化是在南宋釉料改革后发生的,因此其变化是否与釉料有关?南宋与元代的青釉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其装饰的变化是否还和釉料相关?为解决这些疑惑,我特从上海博物馆藏品中挑选了南宋、元等不同时期的龙泉青瓷,并请我馆的熊樱菲测试釉的组合成分,同时将熊先生以往测试的北宋龙泉标本的报告综合起来进行分析^[6]。首先从所选标本及馆藏品看,北宋二片标本的釉层多薄,釉透明,釉色青绿(标本1)青黄(标本2)皆有;南宋(中晚期)器物的釉层多厚,釉面失透,釉色粉青、梅子青、青黄皆有,从窑址出土标本的断面往往能观察到多次上釉、多次素烧的痕迹,所选测试的4件器皿多为典型的南宋制品,其中莲瓣纹碗元中晚期继续烧造,但元中晚期的小足底心微微凸起,而此碗则为平底小足,具有南宋制品的特征;元代出土的龙泉标本多次施釉、多次素烧的现象虽不如南宋多见,但釉的外观特征基本相同,所选4件测试器皿的釉层多很厚,釉面失透,釉色粉青、青黄等色皆有,其中除

碗式承袭南宋而来外,其他3件器物均为典型的元中晚期制品,两件粉青釉制品多点加褐彩,一件八角型高足杯青黄釉面有开片。现将上述器物、标本釉料的测试数据列表如表一。

从列表所示数据看,北宋釉料中所含助熔剂CaO很高,测得含量范围大致在15%~18%,而K₂O、Na₂O的含量不太高,其中K₂O测得范围在1%~2.59%,同时MgO、TiO₂、MnO、Fe₂O₃等元素的含量则处在较高的范围,表明北宋龙泉青釉属石灰釉的范畴,显示了透明薄釉的特点;南宋中晚期釉料中的CaO含量降低,测得范围在8%~14%,而K₂O、Na₂O的含量则明显升高,K₂O在4%~5%之间,同时TiO₂、MnO、Fe₂O₃等含量降低,说明南宋龙泉青瓷在生产过程中对釉的原料的处理更加严格,其釉已属钙碱釉范畴,显示了厚釉失透的特点;典型元中晚期龙泉釉料中的K₂O、Na₂O含量更高,其中K₂O测得范围在4.98%~6.23%,这可能是元代大部分器皿并不多次施釉,然仍保持失透厚润特点的原因。南宋与元釉料属性的一致,表明釉的化学成分与器物装饰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

2. 龙泉青釉装饰是由于时代风格的变化而改变的

龙泉青瓷装饰的变化与釉料成分的改变无直接联系,这已在上述测试中得到证实,笔者以为,龙泉青瓷的装饰主要是因为社会时尚的变化而改变的,而这种随时尚变化而改变的目的则是为了竞争市场。

虽然龙泉地区生产瓷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1600多年,甚至更早,但形成龙泉青瓷装饰风格的时间则在北宋,此时的越窑虽仍为朝廷烧造贡瓷,但其地位已受到耀州窑的挑战,特别是民用品,北宋耀州窑在与越窑竞争的过程中,凭借着犀利的刻划花纹、滋润的青绿釉色、坚硬细腻的胎骨、精美的器物造型,成为继唐、五代越窑之后执北宋青瓷生产之牛耳的窑场,耀州窑逐渐取代越窑,成为南北青瓷生产的楷模,龙泉窑虽在北宋迅速崛起,成为众多青瓷窑场中可与耀州窑抗衡的窑口,亦采用刻划花装饰瓷器,但其刻划花较耀州窑始终略逊一筹,尽管如此,北宋各大青瓷窑场乃至龙泉窑瓷器上大为流行刻划花技法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同时也反映了各大窑场为竞争市场,在瓷器装饰上所作的努力。

南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在杭州凤凰山与郊坛下建立官窑,龙泉毗邻杭州,在与耀州刻划花青瓷竞争处于下风的情况下,转而学习吸收南宋官窑先进的制瓷工艺:胎釉配方、施釉方法、造型设计、装饰艺术等^[7],如官窑瓷器多次上釉多次素烧以釉色取胜的装饰使龙泉窑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在改用瓷石和紫金土两种原料配成的胎土同时,对釉料亦进行了新的调配,即由石灰釉改用石灰钙釉,釉面失透柔和。多次上釉,多次素烧工艺使龙泉青瓷呈现出全新的风貌,并以莹润似玉的高质量釉面装饰,很快超越耀州窑,成为南宋青瓷生产的龙头,青绿厚釉成为南宋龙泉瓷器的一大特色,印刻花工艺与官窑一样,不占青瓷装饰的主导地位。可见南宋龙泉窑借鉴官窑新技术,形成青瓷装饰新风格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元初南宋官窑虽然已停烧,但杭州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此处窑场与烧窑的技术资源一度仍被利用,烧制仿宋官窑器及哥窑器,青瓷仍以釉色取胜,元初龙泉青瓷的装饰同样维持着相同的风格。然而这一局面由于景德镇窑的异军突起很快得以改变,14世纪景德镇窑成功烧制了青花、釉里红及青花釉里红等彩绘品种,长期以来以单一青瓷釉色占瓷器装饰主流地位的局面终于被打破,景德镇窑鹤立鸡群,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瓷器窑场。在此形势下,龙泉窑要维护青瓷统领天下的权益,在国内外瓷器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只能通过装饰的改革来与景德镇窑的彩绘瓷器展开竞争。从传世与出土龙泉青瓷看,龙泉窑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使单一的青瓷釉面上也出现与彩绘瓷一样丰富多样的图案,为达到这一目的,刻、划、印、贴、剔、点彩等各种技法多出现在龙

泉青瓷上,其中除传统的各种工艺外,还首创露胎印花、贴花等技艺,并将多种技法集于一体,极变化之能事,其中许多图案直接借鉴景德镇而来。如集宁路窖藏出土的龙泉青釉碗盘,器内底心多有戳记印花而成的折枝花图案,其中折枝菊花纹与同出景德镇青花图案一致。除在青釉瓷上装饰纹样外,龙泉窑还试图用传统的点加褐彩与点加铜红斑来与景德镇窑的釉里红斑块媲美(图十一、十二、十三),这些努力,使龙泉窑自元至明初,成为唯一可与景德镇一样扬名中外的窑场。然而,因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变化,龙泉窑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衰退的命运。但是元代龙泉窑在竞争中所作的努力,则使龙泉青瓷装饰展现了新的时代风格。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龙泉青瓷装饰变化的三个时段分别在:北宋至南宋早期(即12世纪后期);南宋中期(13世纪)至元早期(14世纪初);元中期(14世纪30年代)至明早期(15世纪早期)。
2. 根据遂宁金鱼村窖藏所出龙泉窑等器皿不可能是1236年之前产品,同时在此之后的40年间四川始终处在战乱之中,不可能再将大批瓷器运抵四川的史实分析,金鱼村窖藏的时代当在元早期。
3. 龙泉青瓷装饰的变化与釉料改革没有直接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迎合时尚、竞争市场。

[1][7]朱伯谦主编:《龙泉窑青瓷》,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9月。

[2]江苏溧水元代窖藏出土的哥窑瓶颈部颇长,显示了元代制品微有变化的特点。南京明嘉靖十二年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仿哥釉贯耳瓶系仿元制品,管状颈甚长。

[3]陆明华:《四川遂宁出土瓷器及窖藏时代问题探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3期,2001年6月。

[4]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概述》,《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8月。

[5]陈文平:《卵白釉瓷器年代考》,《景德镇陶瓷》1990年第1期。

[6]熊樱菲等:《历代龙泉青瓷釉的初步研究》,《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2期。